

【思想文化】

秦帝国的功业观

田延峰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秦帝国建立之后,为了寻求统治的合理性,从思想上对其功业予以阐发,肯定功业的伟大性,显示功业的神圣性,弘扬功业的正义性,将现实成功与长远利益、个体人格与国家统治、天人关系与道德追求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观念系统,这是战国时期功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功业观;秦帝国;三皇五帝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3)03-0003-03

On the Notion of Achievement in Qin Empire

TIAN Yan-feng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For searching rationality of domination, the Qin empire clarified the notion of achievement in theory, affirmed the grandness of achievement and showed sanctity of achievement and develop righteousness of achievement after the empire was established. Then, the Qin empire integrated long-term advantage into reality, integrated individual personality into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ntegrated moral seeking into relations of nature-human to form an notional system. It wa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benthamism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y words: notion of achievement; Qin empire; Three Emperors and Five Sovereigns

公元前 221 年,秦扫六合而一统,称帝而治,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帝国。在统一伊始,秦帝国君臣就自称“成功”。但是,这种自我歌颂并不仅仅限于歌功颂德,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意义,体现了一种系统的“功业观”。

一、秦功业的内容

《史记·封禅书》云: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骀峰山,颂秦功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称颂始皇,“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秦帝国君臣一致称颂的功业有其具体的内容。

秦帝国的功业首先是灭六国而一统。秦始皇刚继位时,因为年少,由吕不韦主政。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1]李斯初至秦时,为吕不韦舍人。吕不韦保荐李斯为郎,李斯游说秦王说:“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

业,为天下一统。”^[1]于是秦开始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至始皇 26 年,秦先后灭韩、赵、燕、魏、楚、齐。秦初并天下,始皇就下令说:“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最后议定称“皇帝”,“朕为始皇帝”^[1]。在秦帝国短暂的统治时期,灭六国而一统始终是君臣所津津乐道的“成功”。

秦帝国功业的另一方面,是其建立的专制集权统治模式。从始皇 27 年开始,秦始皇多次巡游天下,每到一处,都要刻石颂功。秦帝国的政治制度、统治模式是刻石中所称颂的最主要的方面,如琅邪刻石云:

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抆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

收稿日期:2003-06-16

作者简介:田延峰(1966-),男,陕西合阳人,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秦汉思想文化研究。

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1]。

刻石所称颂的内容包含了秦的尚农政策、统一度量衡、实行法治、郡县制及官僚制度等。

二世继位后,继续称颂秦帝国的功业。二世元年诏书云:

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使刻左,使毋疑。

诏书肯定了秦始皇的功业,同时表示要将统一度量衡的法令继续推行下去,以彰显秦始皇的“成功盛德”。二世元年诏书也被刻在度量衡器上,一般刻在始皇 26 年诏之后^[2]。

秦帝国的功业又被称之为“帝业”,这并不是仅仅因为秦始皇称帝而治。“帝业”实际上表明了秦帝国的统治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形态,即涵盖了秦大一统的疆域,又涵盖了秦帝国的各种政治制度。

对于秦之所以能够建立“帝业”,在初并天下时,秦始皇自己有番解释,他认为主要是其它诸侯国背“约”而导致的结果^[1]。“约”指会盟双方缔结的约定,春秋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盟誓的约定规定盟誓各方的权利、责任、义务等。就缔结盟约这种方式来说,双方都是平等的。在春秋战国列国并立的形势下,这种形式是列国外交的重要方式。但对建立大一统专制集权统治的秦帝国来说就不合适了。秦帝国没有也不允许有与秦始皇平等的人与他缔结盟约。统一之后,秦帝国追求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以背约解释“帝业”的建立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很快就改变了方向。

二、秦功业观念

秦始皇在称帝时曾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秦刻石亦云:“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制”^[1]。群臣称颂秦之功业,亦企求“长久”,“传万世”。为了使秦帝国这份功业能够子子孙孙永远承继下去,秦帝国君臣以“功业”为基础,从思想上予以阐发,为秦帝国统治寻找合理性依据。

首先,正面歌颂秦帝国的功业,肯定其伟大性。

在秦始皇令臣下议帝号时,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

所不及^[1]。

五帝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传说中的五位伟大君主,但五帝究竟是哪五人,则有不同的说法。据统计,截止汉晋,各种不同组合的五帝说有七种,至少有四种形成于先秦^[3]。此外,三王也被纳入了秦帝国君臣的视野。始皇 28 年的琅邪刻石中说:“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1]三王指的是受命而王,奠定夏、商、周三代基业的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3]。秦始皇所建立的伟大帝国被认为远超五帝三王,前所未有。

五帝还是传说时代的文化英雄,他们有很多创建制作之功,造福百姓,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黄帝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他被称之为“人文始祖”,许多发明创造都被归之于黄帝^[4]。作为“功盖五帝”的秦始皇,创建制作之功也远超五帝,统一的秦帝国就是秦始皇最伟大的创造。仆射周青臣曾称颂始皇说:“自古不及陛下威德”^[1]。个人的创造性,功业的伟大性,在此融为一体,获得了权威性。

其次,通过“法天”、封禅等行为,显示功业的神圣性。

秦始皇灭六国之后,群臣颂功说:“赖陛下神灵一统”。秦始皇在人格上已不被视为普通人,而具有神异特征。在宇宙制度上,秦始皇打破旧制。始皇 27 年,“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1]。《史记·天官书》:“中官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是最尊贵的天神。现在的研究表明,“太一”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是一种兼有星、神和终极物三重含义的概念^[5]。秦始皇显然是通过“法天”自比为天神太一,使自身人格神圣化。进而,由他所创立的秦帝国这一伟大功业就和天联系在一起,变成神圣功业了。

始皇 28 年,秦始皇东巡郡县,趁机举行了封禅大典。根据《史记·封禅书》,封禅需要一定的条件,“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用事希。”封禅的基本条件是符瑞、功、德。其中最重要的是功。《史记·封禅书·正义》说:“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这种解释更符合秦始皇封禅的目的,就是使秦帝国功业获得天地认可,从而神圣化。

第三,抨击六国的暴虐,弘扬功业的正义性。

在初并天下,秦始皇给丞相、御史所下的令里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1]这里除了肯定“宗庙之灵”的支持帮助外,他将自己灭六国的“功业”说成是一件义举,而“六王咸伏其辜”。辜即罪,《诗经·小雅·正月》:“民之无辜。”成语有“死有余辜”。秦始皇从道德上对灭六国的行为予以肯定。这一点得到了臣下们的积极回应,将灭六国说成是“兴义兵,诛残贼”。之果刻石云:

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悼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1]。

秦始皇被说成是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的大救星,他统一六国是“德”、“义”、“信”的行为,六国则是残民以呈的暴君奸臣。在秦帝国歌颂功业的言辞中,形容灭六国是“义诛”、“义威”、“武德”、“圣德”等,而六国被说成是“强暴”、“暴逆”、“暴虐”、“暴悖”、“无道”、“乱贼”等。秦帝国由此披上了正义的道德外衣。客观地说,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战争,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战争并不是自说自话的正义之战,秦帝国君臣从主观上并未顾及百姓的利益,统一后实行的也是专制统治。吕思勉先生曾言:“争夺相杀之局,不外两端:一恃强力夺人之所有以自奉,或役人劳作以自养。”^[6]这作为对秦与列国战争的评论倒是很恰当。

通过对功业的伟大性、神圣性、正义性的阐发,秦帝国君臣企图使其统治获得更多的合理性。在这种阐发过程中,现实成功与长远利益、个体人格与国家统治、天人关系与道德追求被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观念系统。

三、社会根源及教训

秦帝国的功业观念是战国时期尚功政策、功利思想及功业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程度不同地实行了赏功政策,而秦国则将赏功政策绝对化。秦在商鞅变法时,将“功”作为官吏选拔升迁和取得富贵的主要标准,《史记·商君列传》说:“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书·靳令》云:“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其中又对军功特别重视,《史记·商君列传》:“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赏功政策为人们敞开了追求功名利禄的大门,

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现实功利的追求,“士无定主”、“邦无定交”的局面又助长了这种风气,“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1]是许多士人的梦想。为了获得官爵利禄可以不计手段,投机“市利”的说法频频出现,吕不韦倾身破家结交秦国公子子楚以谋取“无数”之利就是典型的例子。崇尚绝对功利的秦国是猎取功名的最佳场所。李斯审时度势,认定可建功者惟秦,辞师西行时曾说:“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1]李斯就这样怀着追求功名富贵的希望投奔了秦国。

在追逐功利的社会潮流中,逐渐兴起“功业”观。《易·系辞下》:“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时代的变化发展使士更紧密地将自我与社会脉搏联系在一起,“功业”观就是其反映。战国时的“功业”观不同于西周时期的“世功官族”、“子孙相保”,“功”的意义主要局限于家族的兴盛衰败。“功业”将个人价值与社会意义结合在一起,即重视个人的“功”,又重视具有社会意义的“业”。《战国策·齐策六·燕攻齐取六十余城章》:“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知也”;“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功业可明矣。”故士都应该“去忿恚之心,而成终身之名,除感忽之耻,而立累世之功”,这样才能“业与三王争流,名与天壤相敞也”。

战国末期,秦强而六国弱的形势日渐显著,纵横游说之士纷纷鼓动秦建立更大的功业。或称之为“帝业”,《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章》:“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或称之为:“伯(霸)业”,《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章》:“大王拱手以须,天下编随而伏,伯王之名可成也。”“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伯王之业地,尊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或称之为“王业”,《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章》:“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纵横家的名称虽异,实质一样,都是鼓动秦统一天下,建立新王朝。

战国时期的赏功政策、功利思想、功业观念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潮流。秦统一后,对其功业的思想阐发就是立足于这种雄厚的社会基础之上。不过,秦帝国的功业观和战国时期已有很大不同,不是追求

(下转第13页)

几乎不能觉察或说明那样的看法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关于道德的问题,儒学者最关心。但是他们绝不忧郁地认为,在禽或兽,或别的层次上,在四季循环中也部分性地出现与人一样的道德特性。”

把人与自然看作是生命的有机体,贯穿人与自然的儒家的“有机体论的”道德形而上学里,道德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地站在人的立场上的问题,而是一种与自然调和并和谐的自然和谐性的道德论。

在“工具”理性的飞跃发展为其动力的现代产业社会里,虽然它会面向21世纪的“全球化”的道路迈进,但人类在“具有生理自然循环”的总体危机前,要继续生存,就必须首先要尊重自然运动自身的有生命的固有性与自律性;同时,这样的生命尊重的连带感与爱心,不仅在人类之间,而且扩散到和人类一起生存的自然,比如说,关于自然与人之间的生命性和谐的——道德义务。因此,笔者认为,为能从这样的“生态学性质的”危机状况中逃脱,毫无疑问,人们仍然有必要倾听溶解在人类文化认同中的这种强调自然和谐的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呼声。

在人际竞争关系中形成的防御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是儒家传统文化圈里的国家竭力追求的

目标,这仍然是有效的“近代化——现代化”之路吗?对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进行批判的继承,是否应该成为我们新的对策和方案?如果选择后者,必须克服个人的“私心”而具备追求“公共善”的高度的道德意识,还应当实现从制度上能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完善自由透明的民主制度。“家族主义性质”的社群主义,如果没有“公论”的、社会制度的制约,极易滋生“任人唯亲的关系主义”的弊病。因此,笔者认为:批判地继承儒家伦理是21世纪东亚哲学界应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 [宋]朱熹. 四书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4] [宋]朱熹.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 Michael C. Kalton, "Extending the neo-confucian tradition: Questions and Reconceptualiz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C]. Tucker/Berthro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责任编辑:杨彬智]

(上接第5页)

成功,而是肯定秦帝国统治的合理性,追求一种长远的利益。而给功业披上道德的外衣,与战国中后期秦国的绝对功利主义也不相同。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秦思想的重要转变。

秦帝国对功业的阐发,目的在于追求长治久安,但事与愿违,这个庞大的帝国不久就在急风暴雨般的反秦战争中土崩瓦解。秦帝国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功业观念的不合时宜则是思想方面的一个误导。

秦帝国功业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灭六国。秦统一后,民间怀念故国,怜惜旧君的情绪非常强烈。范增劝说项梁立楚王室之后为王时说:“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7]秦帝国对功业的宣扬与阐发更引起了六国人的反感和敌对。张耳、陈余劝陈涉不要称王时说:“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1]在反秦战争中,六国之后纷纷被立为王,发挥了重要的号召力,从而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说文解字》释“功”:“从力从工。”从词源的角度

来说,功重视人的主观努力。秦帝国积极宣传“功业”,对“功业”过度重视。虽然秦帝国宣扬功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长治久安,但却采取了很多短视的功利主义措施,导致其功作过多,徭役赋税过重,完全忽视了规律性的东西,一味强调人的主观努力,从而引起了社会经济的崩溃、人民的反抗。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贾谊曾在著名的《过秦论》中说秦的统一和后来的灭亡是“成败异变,功业相反”,可以说是揭示了秦汉之际一个重要的问题。秦帝国的功业观念及成败得失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索。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王辉. 秦出土文献编年[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2000.
- [3] 刘起钊. 古史续辨[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4] 齐思和. 中国史探研[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5] 李零. 中国方术续考[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 [6] 吕思勉. 秦汉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7] 何建章. 战国策注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辑:杨彬智]